

平型关战役遗址

夜袭阳明堡机场遗址

忻口战役遗址

娘子关战斗遗址

“百团大战”纪念碑

左权殉难处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山西

山西抗战文学

SHIJIE FANFAXISI ZHANZHENG
ZHONG DE SHANXI
KANGZHAN WENXUE

主编 / 杜学文 杨占平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上卷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山西抗战文学

SHIJIE FANFAXISI ZHANZHENG
ZHONG DE SHANXI
KANGZHAN WENXUE

主编 / 杜学文 杨占平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山西抗战文学:全2册/杜学文,杨占平主编.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378-4343-0

I. ①世… II. ①杜… ②杨…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山西省 IV. ①I21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0944号

书 名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山西抗战文学(上下卷)
主 编 杜学文 杨占平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谢 放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427288(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总 字 数 783千字

总 印 张 53.75

版 次 2015年6月 第2版

印 次 2015年6月 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343-0

总 定 价 128.00元(上下卷)

导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这一文学形态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面,即:以苏联(包括东欧各国)为代表的卫国战争文学;以美国(包括西欧各国)为代表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以中国(包括东南亚各国)为代表的抗日战争文学,此外,还有德、日、意等国作家创作的反法西斯文学。总体而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经历了一个“文学反法西斯”到“反法西斯文学”的过程。即在战争时期,更多的是以文学为武器来支持反法西斯战争,更多的出现的是中短篇作品与纪实性文学,如苏联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瓦西列夫斯基卡娅的《虹》、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等等。而到了战后,则更多的是以文学来反思、回顾反法西斯战争,更多的出现了一批大部头的作品,如苏联邦达列夫的《热的雪》,西蒙诺夫的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的夏天》,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恰科夫斯基的五卷本《围困》,美国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法国萨特的三卷本长篇《自由之路》,法国阿拉贡的六卷巨著《共产党人》,写二战初期西班牙战争的西班牙作家瑟塞尔·阿科纳达的《塔霍河》,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希望》,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揭露意大利法西斯的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丰塔玛拉》等等。

第二,对反法西斯战争做了全方位的展示。除上面提到的鸿篇巨制外,这种全方位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概括:写正面战场,如苏联阿纳尼耶夫描写库尔斯克战役的《坦克成菱形队形前进》、苏·鲍金写攻克柏林之战的《战争是这样结束的》、马尔科夫写苏联远东军击败日本关东军的《步兵战士》等等。写游击战的作品,如前南斯拉夫作家伊萨科维奇的《红披肩》、捷克作家卡尔契克的《自

由之路》、保加利亚作家斯塔内夫的《傍晚静悄悄》等等。揭露战争期间社会、军队腐败行为的作品，如英国作家伊夫林沃的《荣誉之剑》三部曲等等。写战争中的精神世界的作品，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母与子》，法国沦陷期间女作家特丽奥莱的《阿维依情侣》，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等。

第三，揭露了法西斯的暴行。如曾任美国总统大屠杀调查委员会主席的维埃泽尔写纳粹大屠杀暴行的三部曲《黑夜》《黎明》《车祸》，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里逃生的意大利科学家莱维写的《如果这是一个人》，以及另一幸存者博罗夫斯基的小说《请大家到煤气室去》，澳大利亚作家肯利尼的《辛德勒的方舟》和著名的十六岁少女安妮留下的《安妮日记》等等。

第四，用荒诞的写作手法写法西斯主义的丑恶本质。如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讽刺意大利法西斯的《化装舞会》，法国作家加缪的寓言式小说《鼠疫》，英国作家奥维尔的《1984》，德国作家格拉斯的《铁皮鼓》，美国作家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等。

第五，对战争进行深刻反思的作品。如美国作家梅勒的《裸者与死者》，琼斯的二战三部曲《从这里到永恒》《细细的红线》《口哨》，德国作家雷马克的《黑色方尖碑》《里斯本之夜》，伯尔的《流浪人，你若来斯巴……》，菲曼的《战友》，蒙德施托克的《直到最后一个人》等等。

纪实类文学在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如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海明威的战地报道《向巴黎进军》《我们攻入巴黎》，记述西班牙内战的伊斯卡赖的《钢铁硬汉》，记述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的乔拉科维奇的《解放战争纪实》，记述保卫布列斯特要塞的斯米尔诺夫的特写集《布列斯特要塞》，对美国二战士兵进行采访结晶的安布罗斯的《兄弟连》等。二战期间高级领导人、将帅的回忆录在纪实类文学中颇具分量。这其中有英国首相丘吉尔六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征战欧洲》，苏联元帅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的《毕生的事业》，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等等。

中国抗战文学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沦陷区的文学。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品是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鹈鹕湖的忧郁》、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骆宾基的《幼年》、罗烽的《呼兰河边》等等。他们的作品率先写出了被异族统治的痛苦与对之进行反抗的怒火,被称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

第二,国统区战时文学。国统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主要有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张恨水描写中国军队保卫国土的《虎贲万岁》,描写南京大屠杀的《大江东去》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火把》、田间的《给战斗者》等表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情怀的抒情诗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剧在国统区的战时文学中,也是一道夺目的风景线。这些作品以古喻今,对激励民族斗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都是其中的亮点。

第三,根据地与解放区战时文学。最主要的代表作家作品是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孙犁的小说《荷花淀》,马烽、西戎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等。此外,光未然(原名张光年)的《黄河大合唱》,桂涛声的《在太行山上》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

第四,外国作家其时对中国抗战进行描写的作品。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英国作家贝兰特写西安事变的《中国的危机:西安事变真相》,以及对毛泽东进行采访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英国“牛津派”诗人奥登等人所写的《战地行》,日本反战派作家鹿地亘的长篇报告文学《和平村记》《我们七个人》,以写《红星照耀中国》闻名的美国作家斯诺的长篇报告文学《为亚洲而战》,著名记者斯特朗的《五分之一的人类》《中国的一百万人》,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等等。

在如此宏阔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及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为参照坐标,来观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山西抗战文学,就会发现山西抗战文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

中抗日文学的重要内容。山西抗战文学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晋绥边区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以国民党管辖的“第二战区”(简称“二战区”)的抗日文学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共同创造了山西抗战文学的辉煌成就。山西抗战文学描写了中国人民,特别是抗日前线及敌后根据地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与伟大的情怀;积聚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艺术家,他们亲身参与了山西的抗战,并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化团体、组织、报刊、剧团,出现了空前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热潮,活跃了山西的文化;在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样式。

(一)

山西抗战文学在文学建制、文学报刊、文学论争等方面形成了具有山西特色的文艺形态。山西抗战文学是在山西特殊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战时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当局首先在山西结成了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共同兴起全民抗战的热潮。在国共特殊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创建了由统一战线领导的政权、军队和团体;各地设有相关的文艺机构或团体。在抗战爆发后形成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单独领导的政权、军队和团体;各根据地成立了专门的文艺领导机构和团体。总体上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具有山西特色的文艺形态,给全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提供了具有类型学意义的文艺形态,丰富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资源宝库。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二战区”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的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地总会”)和创建了山西新军,展开了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战斗,打响了“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战役,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与此同时,“牺盟会”“战地总会”和山西新军领

导开展了抗战前期的山西抗日文艺运动。

“牺盟会”于1936年9月正式发起成立，由阎锡山任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薄一波任常务秘书，主持牺盟会的日常事务。主要成员还有董天知、韩钧、戎子和、宋绍文、刘玉衡、张隽轩等人。此后，阎锡山派代表到陕北，彭雪枫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秘密进驻太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同阎锡山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的全面建立。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牺盟会”掌控了山西大部分地区的领导权。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于1937年9月在太原成立，由各党派、机关、团体及驻军代表共同组成，续范亭任主任委员，杨集贤为副主任委员，总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人民武装部、动员分配部、铲除汉奸部和总务部。南汉宸为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程子华为人民武装部部长，王尊光为动员分配部部长（因未到任，由武新宇副部长担任），郭任之为铲除汉奸部部长。这是山西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团体。

山西新军是在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背景下，由“牺盟会”和“战地总会”共同组建的。“牺盟会”成立后，于1937年8月1日建立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此后，牺盟会负责人薄一波取得阎锡山同意，又迅速组建成四个决死纵队和一个工人武装自卫队。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晋西、晋西北组织起十多支游击队，后来改编为暂编第一师。1938年又组织起政治保卫队本队及一、二、三、四支队等，后扩编为二〇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三个旅，形成总计拥有9个师、旅，约50个团，近7万人的山西新军。山西新军是在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组建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

“牺盟会”“战地总会”和山西新军在山西各地、各部队建立文艺宣传组织，创办报刊，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文艺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抗战初期山西抗战文艺的繁荣。仅在戏剧运动方面就有“牺盟会”吕梁剧社、“战地总会”战地宣传团、第二战区抗战协会歌剧队、话剧队，山西新军决死纵队前线剧社，工人自卫旅的工卫剧社等众多戏剧团体，他们不但在部队内部演出，鼓舞士气，活跃生活，而且也深入到山西各地进行公演，起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的作用，大大鼓舞了群

众的抗日斗志,促进了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太原于同年11月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挺进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山西抗日军民经过1939年一年的反围攻、反“扫荡”、反顽作战,粉碎了敌、顽夹击,晋察冀、晋冀豫、晋绥三大边区基本上结束了抗战初期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完全控制了晋绥之晋西北,晋察冀之北岳、冀中,晋冀豫之太行、太岳、冀南等广大地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团体和文艺领导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领导和推动了山西抗日根据地空前繁荣的文艺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领导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晋察冀边区文化工作协会(简称“文协”)于1938年4月成立,1939年2月15日改名为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边区文救会”),选举叶正莹、邵子南等11人为执行委员,叶正莹、邵子南、周明、陶宗侃为常委。以后,执委会推举刘平为主任(兼任《抗敌报》副总编),叶正莹为副主任,并建立常设机构,决定出版综合性刊物《边区文化》。相继成立各专门协会。1939年7月7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简称“剧协分会”)成立,并发表宣言。会议决定由抗敌剧社、西战团和战线剧社各推举一名代表建立常设机构,选罗东为主任。1940年7月2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简称“文协分会”)正式成立。会议选举沙可夫、田间、魏巍、河洛、康濯5人为委员。会议还就边区的文艺现状和发展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边区文联”)于1941年6月16日成立,取代了边区文救会。会议讨论了如何开展创作活动、文艺批评、乡村艺术活动、出版工作、文艺工作者学习理论和深入实际问题,并推举沙可夫、罗东、周巍峙、史立德、叶正莹、金肇野、沃渣、田间为常务委员,沙可夫为主任。从此,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8月晋冀豫边区基本形成。晋冀豫边区的文艺领导机构是先筹建各专门文艺协会,后才成立总领导机构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区分会(简称“剧协分会”)于1939年2月28日在长治成立。选举太行山剧团等13

个单位为执委。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国总会(简称“文教总会”)于1939年5月4日在沁县成立。大会选举王振华、史纪言、王玉堂、高沐鸿及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为总会委员。晋东南文教总会于1940年10月19日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杨秀峰、徐懋庸、任白戈、李伯钊等为执委。后来将晋东南文化教育抗日救国总会改称晋东南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联”)。1941年7月,晋冀豫和冀鲁豫两块抗日根据地合并,成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原设在晋东南的晋冀豫边区文化联合机构相应改称晋冀鲁豫边区的文化联合机构,与此相应,原晋东南文联也称“太行文联”或“晋冀鲁豫文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简称“文协分会”)于1939年11月28日在武乡下北漳村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选举李伯钊、蒋弼、孙泱、王玉堂、洪荒为常务理事,并分别在太南、太岳、太北、冀西等区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和出版文艺刊物。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是全国文协成立后在敌后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分会组织。

晋绥边区的文艺工作主要由边区文化教育界抗日联合会领导。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晋西北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晋西文化教育界抗日联合会(简称“晋西文联”)的筹备工作主要由亚马、卢梦、伍陵3人组成党支部负责。1940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由张稼夫、赵林、杜心源、常芝青等人组成的晋西文联筹备委员会,接着,从延安来的陶剑心、石夫、赵力克、余蔚中、李清宇等参加了筹备工作。同时邀请曾为太原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成员的刘仰峤、廖井丹、樊希骞前来工作。1940年5月4日,晋西文化教育界抗日联合会在兴县城关正式成立。大会就文艺、戏剧、新闻、教育等工作进行了座谈,大会选出以贺龙为首的理事会,亚马当选为文联主席,文联负责人还有卢梦、伍陵,并决议分别成立各协会分会,其中,剧协负责人为伍陵、林彬,文协负责人为卢梦(兼),成员有张非垢、莫耶、田家等。晋绥文联成立后,将晋西南和晋西北的文艺工作做了统一调整、安排和整顿,使得晋绥边区文艺运动与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等地的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促进了整个根据地文艺的蓬勃发展。

正如山西抗日战争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关一样,山西抗战文学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也有着紧密的关系。山西抗日根据地成立中外文化协会,组织

开展相关的纪念活动,在报刊上即时介绍国外作家的反法西斯活动和创作情况。如1940年4月6日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朱德和彭德怀分别当选正副会长,选举11人为理事,领导组织中苏文化的相关事务。当时,国内翻译界翻译介绍了苏联、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作家的作品,翻译苏联的作品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几个边区和东北解放区、山东解放区等地,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56种苏联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中译本的单行本。可见苏联文学对抗日根据地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1]。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团体通过发表宣言或发布通电声援外国反法西斯作家的正当权益和正义事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大会宣言指出:“我们华北敌后文艺战线上的士兵,一向都密切注视着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生长与壮大,对于血腥的战争制造者法西斯主义怀着无限的憎恨;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善良人类抱着至高的崇敬。我们在此谨向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作家,以及正在为保卫世界和平堡垒而战的勇敢的苏联工农红军,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和人民大众的先进作家,致以崇高的慰问与敬意。我们宣誓,将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共为真理正义、人类永久的自由而奋斗。”^[2]集中表达了山西抗日根据地作家对法西斯战争的控诉和对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家的声援与支持。

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在建立抗日救亡的文艺领导组织的同时,先后创办了大量的报刊,促进了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繁荣。如晋察冀边区主要有《边区文化》、《海燕》、《联大文艺》、《文艺工作》、《战地文艺》、《抗敌报》副刊、《诗建设》、《边区诗歌》等,晋冀鲁边区主要有《文化哨》、《文艺轻骑》、《新华日报》副刊、《新地》、《新华文艺》、《黄河日报》副刊、《燎原》、《山地》,以及八路军总部的《战斗文艺》等,晋绥边区主要有《抗战日报》(后改为《晋绥日报》)、《五日时事》、《晋西大众报》、《文化导报》、《战斗文艺》等。

由“二战区”本部创办的有《阵中日报》《西线文艺》等,“牺盟会”创办有《牺牲

[1]参见《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出版公司1989年版,327页。

[2]《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大会宣言》,1941年9月1日《华北文艺》第5期。

救国》《先锋半月号》等,各中心区都有报刊出版。如太原中心区的《太原战区》、长治中心区的《黄河日报》、岢岚中心区的《大众化》、临县中心区的《临县战号》等。“战地总会”有《战地通讯》(日刊)、《战动周刊》、《动员半月刊》等报刊;各地“战地总会”都出版有报刊,如临县有《抗战形势》《战旗》,忻县有《战争》《农村救亡》《大众呼声》,岢岚有《抗日自卫》《抗日建国》等。山西决死四纵队办有《前线报》《前线月刊》《前哨》,决死二纵队的《长城报》《长江报》《游击报》,工卫旅办有《工卫报》,暂一师办有《长城报》等等。这些在抗战前期创办的大量报刊,促进了山西抗战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外国友人作家发表有关山西抗战文学作品的报刊,现在有据可查的有国内的《新华日报》《新中华报》《大众日报》等,美国出版的《美亚评论》等。他们的著作由美国先锋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

抗战初期,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就文艺理论问题和一些文艺现象展开了讨论。

早在1936年太原沦陷以前,山西文学界曾就“国防文学”做过广泛的宣传和发动。当时在上海有两个口号(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之争。山西处于华北抗日前线,所以着重宣传“国防文学”。因此,也出现了许多以“国防”为主题的作品,1936年12月赵树理写的《打倒汉奸》就是一例。

本时期的文艺论争,首先是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和大后方重庆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关注。尤其是太行根据地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刘焚发表《谈谈文艺的民族形式》,批评向林冰的“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1]。他认为,敌后活生生的新的现实,应该产生出一种活生生的新文艺。这种新文艺,在内容方面是最富于现实性的,在形式方面也是最能表现今天敌后的高度紧张热烈的战斗现实的。它应该是从民族的旧形式、“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去摄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同时,主要要求作者从伟大的现实当中吸取其创作源泉。一切旧形式的利用,只能是为了最生动、最恰当地保鲜现实,只应该是

[1]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载1940年3月24日重庆《大公报》。

摄取其精华,只应该是为了打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绝不是机械地照抄一遍,把新的现实削足适履地硬往旧形式里套。^[1]刘备耕发表《民族形式,现实生活》的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对旧形式的改造问题,他指出:“旧形式不加以必要的适当的改造,不吸收新的滋养料,就不可能表现现实,更不可能成为民族的形式。”^[2]张秀中发表《关于“民族形式的主体”》一文,批评刘备耕把“旧形式是不是民族的形式主体”与“旧形式如何才能成为民族形式”混为一谈。他认为今天的“新形式”应该就是民族的新形式,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民族形式不能像刘备耕所说的是大众所熟悉的形式,而应该是民族形式可以代替大众所熟悉的旧形式,“新形式”即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今天创造民族形式就应以它为主,继承它的光荣传统,并发扬光大之”^[3]。此外,徐懋庸、任白戈、蒋弼等人都发表文章,阐明各自的观点,使讨论进一步深入,问题更趋于清晰。

其次,是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过三次讨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就此也开展了讨论。尤其是在太行区,讨论尤为热烈。讨论是由“通俗化研究会”发起。当时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认为新文艺应该以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知名作家的成功作品为标本,强调语言的科学化、文体的现代化。这部分人对明清以来的通俗章回小说重视不够,瞧不起普通的群众性的文艺,认为太土气。另有少数人,以赵树理、王春等人为代表,力主文艺应该通俗化、群众化、大众化,积极拥护鲁迅关于大众化的主张,认为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不够通俗化、大众化。据此,赵树理、王春、林火等人组织了“通俗化研究会”,参加的人员还有袁勃、李庄、江牧岳、冯诗云、章容等人。他们以《抗战生活》为阵地展开讨论。他们在《抗战生活》革新号二卷一期上发表署名“吉提”(“集体”的谐音)的《通俗化“引论”》的文章,文中指出:通俗化“不仅仅是抗战动员的宣传手段”,“它还得负起‘提高大众’的任务”;“它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通俗化的任务在于‘普及文化’,‘提高大众’”。文章批评了把“通俗化”与“通俗

[1]刘梵:《谈谈艺术的民族形式》,《华北文艺》创刊号,1941年5月1日。

[2]刘备耕:《民族形式,现实生活》,《华北文艺》第三期,1941年7月1日。

[3]张秀中:《关于“民族形式”的主体》,《华北文艺》第四期,1941年8月1日。

文艺”混为一谈的错误。他们在《抗战生活》革新号二卷二期发表《通俗化与“拖住”》，署名“陶伦惠”（“讨论会”的谐音）。文章把“提高大众”的任务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改造大众迷信落后思想，使大众都能接受新的宇宙观；第二是灌输大众以真正的科学知识，扫清流行在大众中间的一些对事物的错误认识；第三是在文字方面，也应该使大众逐渐能够欣赏新的形式，而不仅局限在旧的鼓词小调上；第四是应该注意到大众语言的选择采用，逐渐克服大众语言的缺点，更进一步丰富大众的语言。”并以这四条标准对当时一些“通俗文艺”给予批评，指出它们“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是绝对要不得的”。后来，晋绥边区文联的亚马和卢梦也发表文章提倡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整个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了工农兵文学高潮。陈荒煤于1947年7月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赵树理方向”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工农兵文学向前迈进。

（二）

山西抗战文学的创作态势如同全国抗战文学创作形势一样出现了蓬勃兴盛的繁荣局面。中外作家创作作品的数量之多难以统计，民众的民间创作无以计数。作品的题旨虽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却异常丰富多彩。作品涉及的样式多种多样，既有精英文学的体式，又有民间文学的品种。整体创作虽然是较少文学性，少有史诗性和经典性的作品，但却是具有无法估量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精神财富。山西抗战文学史无前例的繁盛创作态势为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种繁盛创作态势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绝无仅有的文学丰盛时代，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诗歌作为时代的号角，在全民抗日救亡的艰难时刻，以嘹亮的声音响彻山西大地。田间于1938年秋离开延安，随西北战地服务团经岚县到晋察冀边区，与邵子南、史轮、曼晴等人创作并推动“街头诗”热潮。他的“街头诗”名作《假使我

们不去打仗》就发表在沁县出版的《新华日报》^[1]上。通俗、易懂，又鼓动性很强。他的《垦荒团》《种子》《来，靠山沟挖起》等诗，动员群众增加生产，支援抗战。《反正》则是“撒向碉堡”，规劝伪军“和同胞走一条路”。

高敏夫热心于把“街头诗”的种子播向敌后根据地。他成立街头诗社，创作了大量“街头诗”，如《抗战进行曲》《我们是无敌的游击队》《要打得日本强盗回东京》《献给八路军出征将士》等都被谱成歌曲。有影响的“街头诗”还有史轮的《儿歌》，巩廓如的《少年先锋队》《香姑娘》，林火的《老乡你过来》等。

1938年初，诗人艾青到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目睹北方人民深受战争灾难之苦，写出名篇《北方》，以及调子高亢、表现抗战必胜的《风陵渡》。抗战初期，诗人方殷两次来山西，写了一批反映山西抗日军民斗争与生活的诗篇。天蓝1937年到临汾参加了八路军，他写了《哭奠》《队长骑马去了》《夜，守望在山冈上》。卞之琳在山西根据地写过《慰劳信集》，包括《前方的神枪手》《地方武装的新战士》《一位政治部主任》《一位“集团军”总司令》等。何其芳根据广灵一个悲壮故事，写成了《一个泥水匠的故事》，还写了抒情组诗《北中国在燃烧》，该诗以岚县为背景，展现出一幅抗战前线的悲壮图景。抗战初期，诗人公木（公亩）到晋西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创作了长篇叙事诗《岢岚谣》，诗歌《我看见你们了》《封底歌》和《风箱谣》等，表达了敌后人民对八路军的爱戴之情。

晋东南根据地于1941年6月成立了太行诗歌社，重要成员有冈夫、袁勃、高沐鸿、洪荒、阮章竞、高咏等。冈夫是创作成绩较突出的诗人，他写有《我喊叫》《晋东南备战小曲》等诗。诗人袁勃作为《新华日报》记者，到晋西北、晋东南采访和深入生活，写了许多宣传抗战的诗歌。其中有以书信的形式表现一个侵华日军士兵怀念故乡亲人的《寄秀子》，歌颂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坚持抗战、抗击国民党顽固派袭击的《不死的枪》等。

高咏和柯岗也是晋东南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和诗人。高咏1941年5月以国际新闻社特派员身份到晋东南根据地，创作的主要诗篇有组诗《麦收季》（四首）、《人民的庆祝》（三首）、《旗帜》（三首）等。他最优秀的作品是长篇叙事诗《漳河牧歌传》，这是一部三部曲式的万行长诗，反映了抗战初期山西苦难的乡村在

[1]华北版1939年3月29号。

党和军队领导下成长、壮大,成为坚强的敌后战斗堡垒的历程。在1942年5月反“扫荡”战斗中,他身背诗稿投入战斗,不幸牺牲,现存只是部分残稿。柯岗1939年从延安抗大毕业后来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办报纸。歌颂战斗、歌颂人民是他这一时期诗作的主调,主要作品有《太行山小景》《我们要到山那边去》和《不知名的作者》等。

太行根据地的王博写过叙事诗《拦车人的故事》,抒情诗《血的歌唱》《河水谣》等。路工(叶枫)发表过《诗三章》。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初编《中国人》周刊时,写了旧体诗《避雨者》《乞丐歌》和许多儿歌、民谣。毕革飞是八路军太岳纵队的政工干部,他写了许多快板诗,人称“快板大王”。在晋绥区,非诤有《夜在行进》《俘虏》等诗作,赵石宾写了《滴水敢笑话大海》《种》等诗歌。

在山西抗战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也创作了一批诗歌,如朱德的《太行春感》和《出太行》、陈毅的《由太行山西行阻雪》和《过汾河平原》、续范亭的《叙怀》等,叙写他们的战斗生活,抒发豪情壮志,成为根据地文坛一道独特景观。

抗战前期,许多外地作家陆续来到山西抗日根据地,与本地作家相结合,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首先来到山西抗日前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吴奚如,创作了短篇小说集《阴阳堡的战火》,连同此前写的短篇小说《肖连长》,得到了茅盾较高的评价,近十万言的中篇小说《汾河上》,则是他抗战初期的代表作。刘白羽在此前后也来到山西抗战前线,写了短篇小说《五台山下》和《在黄河的一个弯上》等。柳青1939年随军来到山西,写了《地雷》《牺牲者》《误会》和《一天的伙伴》等反映山西抗战生活的短篇小说。抗战初期木刻家力群(原名郝丽春)写了短篇小说《野姑娘的故事》,李成深写了短篇《货车司机》,白晓光写了短篇《动员》等。作家魏伯抗战初期来到山西,与胡采合编《西线文艺》,发表了反映山西抗战的小说《战斗线外》《何二扁担》等。作家萧红、端木蕻良1938年从武汉来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萧红写了反映山西抗战生活的短篇《黄河》和《孩子的演讲》;端木蕻良创作了短篇《风陵渡》,抒发了爱国主义情怀,颂扬了民族主义精神。1939年冬,蒋弼来到晋东南根据地,1942年调晋东南文协,主编《华北文艺》,同年5月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他在此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有《我要做公民》《多多村》等。其中《我要做公民》以强烈的政治内容、简练的结构和生动的

语言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成为敌后创作中的优秀作品之一。吴象在晋东南根据地写了短篇《苏科之死》和《老神头》。前者被誉为“排除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而朝着现实主义道路前进的作品”,代表着文艺创作中的新倾向。

在晋西北,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的青年女作家莫耶写了《打碉堡》《我这里还有一挺》《三个皇军和一个女人》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晋西北军民在反“扫荡”斗争中表现出的顽强抗敌意志。194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描写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女青年丽萍与一个工农干部婚后产生的烦恼,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思想感情上的隔膜。晋绥文艺界对作者的文艺思想进行了讨论和批评,作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西北文艺》也因此停刊。

描写农民的斗争生活,反映其理想和追求,是山西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以李庄的《良民证》、苗培时的《鞋》、郭峰的《重上前线》、李欣的《一个通讯员的家世》为代表。它们再现了山西抗战时期从根据地到沦陷区农民的生活和斗争,表明农民已经成为抗日战争中伟大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周而复1942在晋绥兴县期间,写了短篇小说《一个日本女性的塑像》《夜袭》和《班长》。女作家曾克写过表现山西抗战的短篇小说《奔》《掩护》和《爱》等。描写爱国军民浴血战斗的小说有行者的《我们的尖兵班》,康濯的《“卖布”的区长》《农历五月的故事》,萧也牧的《拿破楼》,白嘉的《我终于见着他》等。这些作品勾画出了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与人民群众反“扫荡”斗争的广阔画面。

抗战时期国民党阎锡山管辖的“二战区”也出现了一批作家。有穗青、姚青苗、贾植芳、碧野等。穗青写了反映山西抗战生活的《在火车上》《脱缰的马》《归来》《草原夜话》^[1]。茅盾曾说《脱缰的马》比较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在空前的民族保卫战争中的心理历程,称赞故事结构严谨,心理描写细致,作者是个有才气的人。姚青苗在抗战八年中写出了《中条山的杜鹃花》《乌鲁木齐的夜》《黄河的激流》《猎》《某城风景》等众多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写出了中条山一带抗日斗争的烽火,塑造了青年知识分子、士兵、抗日将领、绿林好汉等各式人物,艺术上

[1]后结集为《脱缰的马》,于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